智能传播时代涉警网络舆情的风险识别与危机应对

■ 孙国良

摘　要　智能传播技术的深度应用使网络舆情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对公安机关舆情风险识别和危机应对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智能技术的驱动下，网络舆情表现出内容生成智能化、情绪动员精准化、传播路径圈层化以及社会动员显性化等新趋向，造成了潜在的风险隐患和危机。然而，公安机关在舆情应对的过程中面临着监测预警滞后、研判分析不足、引导处置被动、协同治理碎片化与社会信任弱化等现实困境。有效防范和应对网络舆情危机，必须根据智能传播时代的特征，着力深化技术赋能，构建智能风险识别系统；提升媒介素养，增强人机协同研判能力；创新制度供给，完善智能传播治理规范；推动平台共治，构建多元参与治理格局；厚植信任根基，优化舆情智能传播环境。

关键词　智能传播　涉警网络舆情　风险识别　危机应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大数据分析等智能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重塑了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方式与传播格局。从 ChatGPT 到 DeepSeek，人工智能已经从单纯的文字生成工具演变为互联网生态的建构性力量，推动着网络舆论环境发生根本性变革。根据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的报告，2023 年以来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谣言数量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其中公共安全类谣言占比最多、增速最快。其中，涉警议题因其高度的敏感性和社会关注度，已成为网络谣言滋生的重灾区，并引发诸多舆情风险和危机。

但是，与传统网络舆情不同，AI 时代的网络舆情及其传播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高度“逼真”，极大增加了对其进行辨识的难度；另一方面，由算法推荐机制所形成的“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使网络舆情演化变得极具不确定性。因此，探讨智能传播时代涉警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与应对方法，就成为当前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郑州警察学院公安管理学院讲师

一、智能传播时代涉警网络舆情的特征及传播规律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算法推荐等技术的驱动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与分发方式已实现高度智能化与精准化。这些技术特质与涉警议题相互交织碰撞，催生出全新的舆情风险图景。具体而言，智能传播时代的涉警网络舆情呈现出如下风险特征与传播规律：

（一）内容生成智能化和虚假信息规模化

智能传播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生产主体从“人”扩展到“机器”，其在提高信息内容生成速度和规模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虚假信息的制造门槛和成本。传统上，谣言信息的生产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内容的仿真程度也较低。而如今，谣言信息的生成者只需要输入特定关键词或指令，就可以利用 AI 工具快速生成内容逼真、欺骗性强的虚假信息，从而实现谣言的高效率和规模化生产。比如，江西省公安机关查处的某 MCN 机构使用 AI 工具造谣案，“5 家 MCN 机构共运营自媒体账号 842 个，长期组织人员选取热点文章，使用 AI 工具批量生成不实文章进行吸粉引流，平均每天通过 AI 工具发布 4000 至 7000 条信息。”这种规模化生产模式使得虚假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充斥互联网，形成巨大的负面传播效应。更具挑战性的是，AI 不仅能生成文字内容，还能伪造图片、视频，甚至是所谓的“官方回应”，并形成相互印证的虚假“证据链”。而一旦这些虚假信息与涉警议题相结合，其破坏力是巨大的，不仅会对网民造成严重的误导，而且也会增加警方专业人员真伪辨识的难度。

（二）情绪动员精准化与舆论极化加速

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高度依赖网络空间的情感动员机制，然而与传统依靠网络中心节点的信息分发形式不同，智能传播时代的情感动员与信息分发机制的算法化特征密切相关。在网络空间中，算法推荐技术通过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偏好，有针对性地在第一时间将信息推送给特定的用户群体，持续强化并产生情感动员。换句话说，智能传播时代的信息分发逻辑不再是“人找信息”，而是“信息找人”，AI 通过特定模型分析用户的点击数、停留时间、评论热度与转发数据等，勾勒出一幅精细的用户偏好图，并推送相关内容来引发用户的情绪反应。涉警议题由于往往涉及民生需求、公正执法等因素，天然具有引发网民情感共鸣的属性。而智能平台会通过情绪化的标题、煽情的表达或刺激的画面，不断强化公众的愤怒、同情与恐惧等情绪。就技术逻辑而言，算法倾向于推送那些能够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使带有情感张力的涉警信息获得更高曝光率和传播速度。当情绪化舆论在算法助推下持续发酵，理性声音会被边缘化，舆论场则会呈现“沉默的螺旋”效应，最终导致舆论走向极端化。

（三）传播路径圈层化与信息茧房强化

智能传播时代的涉警舆情传播呈现显著的圈层化特征。算法推荐技术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浏览历史、社交关系等数据，构建个性化的信息分发模型，将用户隔绝在特定的信息圈层之中。这种“过滤气泡”效应使不同圈层的公众接收到的涉警信息高度差异化——支持警方的用户看到的是正面报道和理性分析，对警方持怀疑态度的用户则被推送大量负面信息和情绪化表达。所谓“信息茧房”，正是描述人们在数字化时代中

被封闭、隔离和限制信息的现象。在信息茧房中，算法会形成一个信息的“过滤泡泡”，使人们更容易陷入信息的局限性之中。当涉警舆情事件发生时，不同圈层的公众基于各自接收到的碎片化信息形成截然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圈层之间的对话变得困难，社会共识难以达成。与此同时，一些 MCN 机构和黑产团队利用这一机制，通过多账号矩阵在不同圈层同时投放特定信息，实现舆情的跨圈层渗透和共振放大。舆情不再是从中心向外围的辐射式传播，而是多中心、多圈层的网络化扩散，传播路径更加复杂，风险识别和危机应对的难度显著增加。

（四）社会动员显性化与线下风险传导

智能传播时代，涉警网络舆情的风险已不局限于虚拟空间，而是日益呈现线上线下的深度联动。网络舆情不仅反映社会情绪，更能动员社会行动。智能传播技术的高效连接能力和实时互动特性，使线上舆论能够快速转化为线下集体行动。涉警事件一旦点燃公众情绪，便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社交平台组织起声援、抗议甚至暴力对抗等现实行动，对社会秩序构成直接冲击。这种社会动员能力的显性化，会使舆情风险升级为公共安全风险。同时，线下事件又反过来成为线上舆情的“燃料”，形成“线上发酵—线下行动—线上再发酵”的恶性循环。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国外势力也利用这一机制，通过政治、经济和商业手段渗透国内媒体和社交平台，在网络上捏造事实或虚假宣传，掌握负面信息话语权，控制舆论导向。这种内外联动的舆情风险，会使舆情治理从单纯的技术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对公安机关的危机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涉警舆情风险识别与危机应对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面对智能传播时代涉警网络舆情的复杂态势，公安机关在风险识别与危机应对方面暴露出诸多现实困境。这些困境既有源于智能传播的技术特性与传统治理模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折射出了理念转变、队伍建设、制度供给等方面的深层问题。系统剖析这些困境及其成因，是构建有效应对策略的认识前提。

（一）监测预警困境：技术迭代与实战应用的落差

当前，全国公安机关对涉警舆情监测预警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多地公安机关都建立起了覆盖全网、全天候的监测体系，监测手段从简单的人工查询、关键词匹配，升级为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文本大数据分析等智能化手段，并依据媒体级别、阅读量、转发量等量化指标，对负面信息进行分级预警。但是，就监测预警而言，技术迭代与实战应用之间的落差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基层应用仍显薄弱。不同层级、地区之间的技术投入差距明显，部分基层单位面对 AI 生成的高仿真与规模化虚假信息，难以实现有效识别和拦截；第二，平台整合仍不充分。系统内部不同部门，以及与政府其他部门相关业务系统相对独立，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通，难以形成全链条的舆情风险感知能力。第三，技术局限依然存在。尽管不少部门已开始探索对 AI 谣言的识别与治理技术，但面对深度伪造、多模态虚假信息等新型风险，技术上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技术迭代的加速，也使得相关部门和人员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方面无法及时跟上，缺少完全适配智能传播特征的

专业化监测工具。

（二）研判分析短板：专业能力与复杂舆情的错位

近年来，公安机关的舆情研判基本实现了从“经验感知”到“数据驱动”的转变，并实现了对所监测信息的多维度评估。不过，舆情研判专业能力与智能传播的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基层民警存在缺乏对 AI 生成内容、算法推荐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深度认知，难以充分把握虚假信息的生成逻辑与传播规律，导致在面对 AI 仿真程度较高的信息时，容易陷入“技术盲区”，无法快速辨识信息的真伪和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面对智能传播时代海量、碎片化且动态变化的舆情信息与数据，传统的舆情研判模式难以捕捉舆情演化的细微趋势和深层关联。再加上传播“圈层化”所导致的信息隔离，研判人员往往难以把握舆情的真实全貌。这些专业能力与复杂舆情之间所形成的错位，有可能导致舆情研判仅停留在对表现现象的描述，或者以偏概全，难以认清舆情背后的情绪动机、利益诉求及潜在的风险传导路径，进而无法有效支撑后续的危机决策。

（三）引导处置不足：高度重视与高效应对的差距

目前，各级公安机关普遍非常重视涉警舆情的处置工作，建立了系统化的工作机制，出台了具体的工作规范，并能够在事件处置中及时介入、第一时间发声。然而，从“高度重视”到“高效应对”之间，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1.“快”与“准”的平衡有待优化

在智能传播时代，舆情信息从萌芽到爆发的窗口期变得更短，这要求公安机关在快速响应的同时，还要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而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仍是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2. 沟通方式与传播规律的契合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面对 AI 时代舆论场的碎片化、情绪化、圈层化等特点，网络回应中诸如程式化的内容表达、过度依赖官方和传统媒体的发布渠道、“等事实查清后再公布”的回应策略等，都有可能导致相关部门错失舆论引导的最佳窗口期。

3.“对话”和“沟通”的舆情处置理念需加强

舆情处置的核心理念是“疏”而非“堵”，是“对话”而非“对抗”。在智能传播环境下，信息传播不再是公安机关向公众单向灌输的过程，而是公众主动参与、多元主体互动的动态对话。因此，要重新审视舆情应对的本质，将舆情治理视为构建警民关系、塑造公安形象的战略契机。

（四）协同治理缺陷：条块分割与系统治理的矛盾

协同机制建设是公安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近几年的积极探索，公安机关基本上建立了涉警舆情协同治理的框架。比如，各地公安机关普遍建立了多部门研判会商与协同处置的工作格局，与政府其他相关部门也建立了常态化的联动机制，甚至摸索出了“警媒协作”“警企联动”的新方法。然而，就智能传播时代舆情协同治理的现实来看，依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内部协同的深度有待拓展

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有时不够及时、不够充分，行动配合也存在不紧密的现象，导致舆情应对的效果有时并不明显。

2. 外部协同机制有待强化

比如与平台企业、主流媒体、社会组织等的合作深度不足，导致舆情引导和处置陷

入被动。这种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与法治保障薄弱：一方面，涉警舆情治理的规范化制度体系仍有待完善，需要构建覆盖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应急处置、效果评估的全流程操作规程和标准，理清各部门的权责边界，理顺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另一方面，面对 AI 造谣、网络水军等新型违法行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还没有及时跟进，导致工作中存在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等问题。

（五）社会信任弱化：刻板印象与舆论极化的循环

涉警舆情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警民信任关系的脆弱性。尽管从整体来看，群众对警察的满意度较高，但网络空间中针对警察形象的负面刻板印象依然顽固存在，并在涉警舆情事件中被反复激活与强化。每当涉警事件发生，网络上便会涌现大量基于过往事件形成的刻板印象的评论，形成“预设立场—选择性取证—强化偏见”的恶性循环。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智能传播环境对社会信任的侵蚀效应。在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倾向于推送易引发负面情绪的内容，使公众对警察的负面认知不断得到强化；信息茧房效应则让持不同立场的人群难以开展有效对话，信任鸿沟日益加深。当社会信任基础薄弱时，即便公安机关做出及时、准确的回应，也可能被公众质疑为“掩饰”“推责”；而当刻板印象固化后，舆情应对的成本便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信任修复非一日之功，这构成了涉警舆情治理最为深层、也最为棘手的困境。

三、智能传播时代涉警舆情风险识别与危机应对的策略

面对智能传播环境对社会信任的侵蚀，单纯的技术修补或被动应对是远远不够的。破解涉警舆情治理困局，需要从技术、能力、制度、关系和生态等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制定一套贯穿风险识别到形象修复全过程的治理策略，形成对智能传播时代涉警舆情的系统性回应。

（一）深化技术赋能，构建智能风险识别系统

面对智能传播时代舆情风险的复杂态势，必须确立以“技术对抗技术”的理念，加快对新技术的应用，构建适应智能传播特性的智能化风险识别系统。

1．构建一体化数据感知平台

应加快推进公安系统内外部数据资源整合，打造一体化的数据平台，形成覆盖全面的基础性舆情数据资料库。

2．推动监测能力均衡发展

根据“统一建设、分级应用”的原则，继续完善由上级公安机关筹建的基础性监测平台，增强基层单位对舆情信息的利用率。同时，针对方言直播、本地化表达等“技术盲区”，要发挥“人机协同”优势，建立方言暗语、本地化表达的特征库，提升技术识别能力。

3．建设多模态智能舆情监测平台

针对智能传播内容生产智能化的特征，整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类型的数据源，进一步强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对全网涉警信息的实时抓取和智能识别。

4．持续开发风险预测预警模型

针对当前信息传播机制的算法化特性，要在深入了解主流平台算法推荐逻辑的基础上，将算法参数融入舆情风险预测模型。依托历史数据，构建舆情演化规律分析模型，对潜在的风险点实施预测和预警。

当然，技术赋能并不是单纯的工具接

入，而是要将其融入整个工作流程，实现与业务的融合升级。

（二）提升专业素养，增强人机协同研判能力

提升民警的专业素养是智能传播时代涉警舆情治理的基础工程。首先，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针对领导干部、宣传民警、一线执法人员等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培训内容与方式，如领导干部侧重智能传播规律认知和战略决策能力培训，以把握舆情治理新特点；宣传民警侧重 AI 识别技术等专业技术培训；一线执法人员侧重智能传播环境下风险防范和现场应对培训。培训内容应涵盖智能传播技术原理、舆情生成机制等方面，既有案例分析、理论讲授，也有实战模拟演练。其次，要进一步培育适应智能时代需求的专业队伍。在公安机关内部，可挑选并培育一批既精通公安业务，又熟悉智能传播规律的专业人才，打造专业的舆情分析师、AI 鉴别员及新闻发言人团队。同时，探索从高校、科研机构、互联网企业引入专业人才的机制，增强舆情治理的专业力量。第三，增强全警对智能传播风险的认识。借助持续的教育与制度引导，让“智能传播时代，人人皆为舆情节点”的观念深入每一个民警心中，把舆情风险防范融入执法办案、窗口服务、社区警务等日常工作中，构建起人人关注智能传播风险、人人参与舆情治理的局面。

（三）创新制度供给，完善智能传播治理规范

在面对智能传播时代的新挑战时，涉警舆情处置工作必须加快推进制度创新进程，打造贯穿舆情治理全流程的规范体系。一方面，要完善适应智能传播规律特征的舆情分级响应机制，根据 AI 时代舆情生成速度快、规模大、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等特点，合理划分风险的类别和等级，明确各等级所对应的责任主体、应对步骤、权限范围与资源分配等，确保舆情风险一经发现就能有相应的责任主体着手展开识别和处置。另一方面，要对智能传播环境中的信息发布制度进行规范。根据智能传播人机交互、多源信息共存的特性，制定统一的信息发布流程，明确规定发布时机、内容口径、发布渠道以及发布形式等要素的规范要求，用“快”且“准”的信息第一时间发出客观和权威的声音。与此同时，还应健全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鉴于智能传播具有系统性、网络化的特点，应发布跨部门协同处理涉警舆情的规范文件，清晰界定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及其与外部进行协作的职能划分与流程。此外，要针对利用 AI 造谣等新型违法行为，研究制定专门的操作指引，为一线执法提供明确依据。

（四）推动平台共治，构建多元参与治理格局

涉警舆情治理不能只依赖公安机关“孤军奋战”，而应根据智能传播的系统性特点，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

1．强化警媒协作，携手面对智能传播的挑战

增进与主流媒体的交流与合作，与有影响力的网络自媒体构建合作关系，借助其平台传递积极声音；与媒体合作开展关于智能传播素养的公众教育，提高公众辨别 AI 虚假信息的能力。

2．强化平台责任，从源头治理智能传播

按照《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要求，督促网络平台加大对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与管理力度，优化流量分发和收益分成机制，最大

程度减少利用 AI 造谣获利的可能性；推动平台完善用户举报渠道，对核实后的不实信息及时进行标注或下架处理；针对算法推荐可能带来的舆论极化风险，引导平台改进算法逻辑，提升正面信息与理性声音的展示机会。

3．引导公众参与，构建警民互动的良性循环

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智能传播素养与信息辨别能力，鼓励公众理性参与涉警议题讨论、积极举报虚假信息。

4．依托专业机构，深入研究智能传播规律

与智库、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开展智能传播时代的涉警舆情研究，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大数据等技术对舆情演化影响的规律。

（五）厚植信任根基，优化舆情智能传播环境

涉警舆情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控制”舆论，而是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因此，必须将形象重塑和信任修复作为战略工程，久久为功。在智能传播时代，要做好舆情治理工作，需要从根本上做好以下几点：

1．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执法不规范、不文明是引发涉警舆情的深层根源，应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细化执法操作标准，强化执法过程监督，确保每一项执法活动都经得起法律和公众的检验。

2．深化警务公开，以透明度对抗虚假信息

针对智能传播时代 AI 虚假信息泛滥的特点，依托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平台，依法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等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对于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在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挤压 AI 谣言空间。

3．创新警民沟通方式，适应智能传播交互逻辑

适应智能传播时代的沟通习惯，积极运用短视频、直播、虚拟主播等新形式，讲述警察故事、展示警察形象。

4．培育积极健康的警民互动文化

在智能传播环境中，鼓励建设性的警民对话，让真实的声音、温暖的故事能够穿透算法茧房，抵达更广泛的公众。

智能传播时代给涉警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同时也蕴含着转型与升级的机遇。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智能传播技术，既可能被滥用来制造和传播涉警谣言，也能成为增强风险识别能力与提升危机应对效率的重要工具。核心在于公安机关是否能够精准掌握智能传播的技术特点与演变规律，以系统性思维构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舆情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揭秘AI谣言：传播路径与治理策略全解析 [R]．2024

[2]李龙飞、张国良．算法时代“信息茧房”效应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理论视角 [J]．电子政务．2022．9

[3]谢新洲、张静怡．智能传播时代的网络内容风险与治理路径 [J]．中国网信．2026．1

[4]陈鹏宇．智能传播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结构优化与法治因应 [J]．天府新论．2025．2

[5]薛可、李亦飞．智能传播时代下算法推荐的时空与重构 [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

[6]黄微、刘毅洲、刘逸伦．智能传播视角下网络舆情风险簇的生发机理研究．情报科学 [J]．2025．9

[7]赵前卫．智能时代移动舆论场的传播特点与舆论引导 [J]．青年记者．2022．3

责任编辑 尚钰涛